

曾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刘蕙菲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 曾国作为周代分封于汉东地区的姬姓诸侯国, 存续约 700 年, 其疆域以湖北随州为中心, 扼守“金道锡行”交通要道, 是周王朝经略南土的战略枢纽。考古发现的曾国贵族墓葬与青铜器群(如叶家山、枣树林、擂鼓墩等遗址), 完整串联了西周至战国的年代序列, 出土的 300 余件带铭青铜器成为研究曾国历史的关键材料。铭文研究揭示, 曾国即文献中的“随国”, 通过“曾侯与”编钟与“楚王滕随仲半加”鼎的互证, 终结了百年“曾随之争”, 其铭文内容、纪年方式及书体演变, 不仅重构了曾国从周室藩屏到楚之附庸的政治嬗变, 还实证了周王朝“涉政淮夷”与“君庇淮夷”并行的南土治理策略。文化层面, 曾国青铜器融合周礼制度与楚地工艺(如曾侯乙编钟十二律体系), 展现了周楚文明的深度互动。技术方面, “金道锡行”铭文与失蜡法铸造工艺, 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巅峰。曾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为周代政治格局、文化交融与技术传播提供了多维实证。

关键词: 曾国青铜器铭文; 曾随之谜; 周楚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 K877.3

文献标识码: A

一、曾国历史与地理概况

(一) 时空范围

曾国是周代分封于汉东地区的重要姬姓诸侯国, 其存续时间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 1046 年前 300 年), 历时约 700 年^[10]。考古发现证实, 曾国疆域以湖北随州为中心, 北至枣阳郭家庙, 南达京山苏家垄, 西抵襄阳, 东及河南新野、桐柏一带。该区域地处随枣走廊, 扼守“金道锡行”交通要道, 是周王朝经略南土的重要据点^[17]。

(二) 考古发现

曾国考古呈现完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以叶家山墓地为代表,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见苏家垄遗址, 春秋中期有枣树林墓地, 战国时期则以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为典型。迄今已发现曾国贵族墓葬 40 余处, 出土青铜礼器逾 2000 件, 其中带铭文者达 300 余件^[9]。

二、青铜器铭文研究

(一) 铭文类型与内容特征

1. 器主称谓

曾国青铜器铭文呈现严格的等级制度。

侯级: 如“曾侯谏”、如“曾侯乙”, 鼎铭“曾侯谏作宝彝”就将器主的称谓体现出来。

公级: 如“曾公求”、“曾公黍”, 都是在铭文中体现器主称谓。

女性称谓: 如“随仲半加”, M169 出土铜器编钟、匕、缶上皆有铭文“随仲半加”。再如“曾姬无卣”, 20 世纪 30 年代遭军阀盗掘的安徽李三孤堆楚王墓中, 有大量青铜器, 其中包括“曾姬无卣壶”。

特殊称谓: 如“曾大工尹季怡”反映职官体系, 这里的称谓格式为“国名(曾)+职

称“十名（十字）”，“曾大工尹季怡”的称谓结构宜解读为“曾（国名）+大工尹（职官）+季（排行）+怡（私名）”，其中“季”作为伯仲叔季的排行标识，与私名共同构成复合人名，此类命名方式在曾国宗室成员中尤为典型（如曾侯乙墓出土编钟铭文中的“季怡”或与“曾侯與”存在宗族关联），M111 出土“狁作刺考南公”簋显示南宫氏与曾国的渊源，但最终结论需结合曾国世系与青铜器断代交叉验证^[4]。

2. 纪年方式

西周至春秋中期，严格遵循“周王纪年+月份”体系，如：随州叶家山 M65 曾侯諫甗铭“唯王五月”（西周早期）；枣阳郭家庙 M1 曾伯文簋铭“唯王十月”（春秋中期）。此时月份前冠以“王”字特指周王历法，各诸侯国奉行《周礼·春官》“颁朔于邦国”制度，岁首建子（以冬至所在月为正月），体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秩序。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现“诸侯国名+月份”自主纪年，典型例证：随州文峰塔 M1 曾侯與钟铭“唯曾八月”；襄阳陈坡 M6 出土楚屈子赤角簠铭“唯正月初吉丁亥”。此阶段周王室丧失“颁朔”权威，诸侯国改用本国历法。曾国采用建丑历（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与周历存在月份差异，故需特别标注“曾”以示区别。战国中晚期，复合纪年模式兴起，反映政治附庸关系，曾侯乙编钟铭“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此处“王”确指楚惠王（《史记·楚世家》载其在位 57 年），印证曾国此时已成楚之附庸。楚国实行“大事纪年法”（以楚王在位年数纪年），但曾人仍保留周式“祀”为年岁单位，形成“楚王纪年+周式年称”的混合体系^[11]。

这一纪年体系的嬗变，本质是青铜器从周王室礼器向列国重器的功能转型——当宗周礼制崩解时，诸侯通过历法独立彰显主权，而附庸国则用双重纪年维系政治平衡，最终在曾侯乙墓器物群中凝固为一部镌刻在青铜上的历法演变史，青铜铭文成为研究先秦历法变革的第一手档案。

3. 铭文章法

西周早期铭文简练，铭文呈现“器主+作器动词+器类名”的程式化结构，如随州叶家山 M28 出土的“曾侯作父乙宝彝”。此时铭文核心功能为祭祀标识，字数多控制在 10 字以内，反映周初诸侯国对宗法制度的恪守^[15]。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出现“器主+功勋叙事+祈愿辞”的复合结构，枣阳郭家庙 M21 曾伯随壶铭文增至 45 字，记载“克逖淮夷”战功，开记事铭文先河^[16]。春秋中晚期出现长篇记事铭文，如曾公求编钟铭文达 227 字，形成“追述先祖-自述功绩-祭祀祝祷”的三段式叙事框架。其四言韵文“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聿怀多福”运用叠字（淑淑）、虚字衬韵（聿）及对仗工整的修辞，暗合《诗经》雅颂体的韵律美学^[2]。战国时期，随州文峰塔 M1 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达 312 字，出现“天命转移”政治哲学论述。文本运用顶针句式，“王遣命于南土，土肇辟□□，□□厥疆”，通过语音回环强化历史叙事，这种文学化表达与清华简《系年》存在互文关系，彰显诸子思潮对青铜礼器的渗透。

这种铭文形态的嬗变，本质是周代礼乐制度从“器以藏礼”向“文以载道”的转型缩影——当宗法制度松动时，诸侯通过铭文重构历史记忆，以文学化的自我叙事争夺文化话语权，最终催生了中国最早的韵文体金属文书系统，从物质载体到文本载体的双重文明跃升。

（二）铭文反映的曾国史实

1. 始封与族源

西周成康时期，为巩固对南方的控制，周王室推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战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南宫括作为文王“四友”之一（《尚书大传》），因辅佐武王伐纣、参与平定“三监之乱”之功，被委以镇守南土重任。

叶家山 M111 簋铭实证，该墓出土铜簋铭“狁作刺考南公”，“刺考”即显赫的先父，

“南公”为南宫适谥称。此铭印证南宫括为曾国宗庙祭祀体系中的始封之祖，与江苏宜侯矢簋“虞侯改封于宜”铭文共同体现西周“公-侯”二级分封制度^[14]。

文峰塔 M1 编钟铭文解析，曾侯與编钟铭“王（周昭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中的“汭土”，经考为汉水东岸随枣走廊，与《水经注·沮水》“沮水南迳随县故城西”记载吻合。周王室命南宫括家族在此筑城建邦，执行“遏绥淮夷，惠于南国”（《诗经·大雅·江汉》）的军事屏障职能^[7]。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太保玉戈刻“命曾侯辟”（“辟”训为治理），与叶家山 M28 曾侯谏墓（约成王晚期）形成时空对应，揭示曾国分封的具体实施者^[12]。

周成王决策分封-召公奭以太保身份执行册命-南宫括受封为“南公”（公爵）-其后裔世袭“曾侯”（侯爵），形成“王-公-侯”三级管理体系。南宫括家族与召公奭家族形成呼应，召公家族主控燕蓟，镇守北土（琉璃河遗址为证），南宫家族坐镇曾随，屏护南疆（叶家山墓地为核心），二者构成周初“北燕南曾”的南北轴心防御体系。《召南》地理范畴正对应南宫括受封的“南土”，其诗篇与曾国礼器存在深层关联，《甘棠》“召伯所憩”之“召伯”即主持曾国分封的召公奭，其巡视南土史实在曾侯與钟铭“王命南公，绥夷不廷”中得到呼应^[2]。

曾国始封史实经由“南宫括受封—召公奭册命—曾侯世守”三重环节确立，其族源可追溯至周初南宫家族。作为唯一完整串联西周至战国考古序列的汉东姬姓国，曾国（随国）的存在既实证了《诗经·召南》的历史地理背景，更揭示了周代分封制度中“公侯并立、南北呼应”的政治智慧，青铜铭文与考古遗存共同书写了一部镌刻在南土之上的姬周宗亲开拓史。

2. 政治地位演变

西周早期，南土军事强权。周初分封体系下，曾国凭借南宫括家族的军事威望，成为镇抚南疆的核心力量。叶家山 M28 曾侯谏墓兵器群出土戈、戟等兵器均含“曾侯”铭文，与簋铭“克逖淮夷”形成互证，显示曾国承担《诗经·常武》“徐方既来，淮夷攸服”的征伐职能。郭家庙 M21 曾伯随壶铭文，“绥怀多福，伐谋淮夷”的记载，对应《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的军事行动，曾国此时作为周室南征的军事补给枢纽^[3]。春秋中期，楚曾联姻与政治重组（前 700-前 500 年）。周室衰微背景下，曾国通过外交联姻重构地缘政治。枣树林 M169 卣加墓实证，墓主为曾侯宝夫人，编钟铭“楚王媵随仲卣加”确证三点，“随”即青铜器铭文中的“曾”，破解文献国名之谜，楚王室以“仲”称体现对曾国的对等外交姿态，“媵”字证实此时联姻属政治结盟性质，非附庸纳贡。墓中楚式升鼎与曾器簋共存，反映两国礼制交融^[6]。战国时期，楚系附庸的维系。曾侯乙墓器物群揭示曾国在楚文化圈中的特殊地位。楚惠王赠钟的政治隐喻，铸钟铭“唯王五十又六祀”指楚惠王五十六年，采用楚历纪年却保留周式“祀”称，象征政治附庸与文化独立的矛盾统一。钟架悬挂位置分析，楚王所赠铸钟占据中下层显要位置，既显示尊崇又暗含等级压制^[5]。

曾国政治地位历经三阶段嬗变，西周时期作为周室南征的军事堡垒，春秋时期通过“曾楚联姻”实现战略缓冲，战国时期转型为保有礼制特权的楚系附庸。这种转变在曾侯乙墓达到顶峰——九鼎八簋的周礼坚守与二十八宿图的楚风浸润，共同凝固了这个姬姓古国在周楚文明碰撞中的独特生存智慧，从青铜铭文到墓葬制度，书写了一部汉东小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史。

3. 婚姻联盟

西周早期，联姻戎狄，固守南疆。周初分封体系下，曾国通过跨族联姻强化对南土的控制。叶家山 M2 联姻实证，出土铜器铭文“曾侯谏作媿”中，“媿”为赤狄隗姓（《国语·郑语》“隗姓，狄人之族”），表明曾侯谏夫人来自北方狄人集团。同墓出土的銎铃车马器（6 马 1 车）与灵石旌介商墓车马配置相似，反映周人通过婚姻吸纳戎狄车战技术^[13]。春秋时期，附楚存续，双向联姻。周室衰微背景下，曾国通过多层次联姻重构生存空间，曾楚王室通婚。枣树林 M169（曾侯宝夫人卣加墓）出土编钟铭“楚王媵随仲卣加”，“仲”字显示卣加为

楚王次女，对应《公羊传》“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制度；文峰塔 M1 曾侯與钟铭“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暗示曾侯母系出自楚穆王家族，形成双向婚姻纽带。汉阳姬姓联姻网，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黄子作孟姬”器群，其中铜壶颈铭“孟姬，朕（黄君）母”，证实黄国国君夫人为曾国姬姓宗女。黄夫人棺内随葬玉器组合（26 件组佩）与叶家山曾侯夫人墓玉器形制高度相似，印证文化亲缘^[6]。战国时期，婚姻遗产与附庸维系。曾楚早期联姻的政治遗产，延续至战国时期曾国的特殊地位。曾侯乙墓的联姻余绪，楚惠王赠钟铭“唯王五十又六祀”，采用楚历但保留周式“祀”称，反映两国历法交融背后的婚姻传统惯性。

曾国八百年存续史，本质是一部以婚姻为纽带的战略调整史，西周时期联姻戎狄构建军事缓冲，春秋时期双向联姻楚国实现附庸存续，战国时期依托早期婚姻遗产维系文化独立。从叶家山的狄女媵器到擂鼓墩的楚式钟磬，婚姻物质遗存与政治地位嬗变形成镜像关系——当曾侯乙墓九鼎八簋遭遇楚式二十八宿图时，这个汉东姬姓古国最终在周楚文明的婚盟遗产中完成了历史谢幕。

（三）铭文字体演变

1. 书体分期

西周早期，该时期青铜器铭文呈现明显的铸造工艺主导特征。铭文字体线条轮廓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单字内部构件（如“蒸汽”等象形部首）的笔画走向存在明显差异，同一器铭中常见方向性不统一的线条组合。这种形态特征与早期范铸技术的不稳定性直接相关，尚未形成稳定的书刻范式，反映出青铜器从实用器向礼器转型过程中铭文功能的初始状态^[8]。春秋中晚期，以苏家垄墓地出土青铜壶铭文为代表，铭文书体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线条开始呈现等距平行排列趋势，字口深度趋于统一，单字结构出现明确的轴线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铭文中已显现鸟虫书雏形，具体表现为“王”“侯”等关键字的个别笔画出现装饰性顿挫与曲笔改造，这种介于正体与美术字之间的过渡形态，折射出礼器功能强化背景下青铜铭文从实用标记向礼仪符号的转型需求^[3]。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错金铭文标志着曾国书体艺术的巅峰。采用失蜡法结合错金工艺的篆书铭文，单字结体呈标准长方形，笔画转折处呈现精密计算的几何角度（平均 87-93 度）。错金篆书特有的“玉箸体”特征已完全成熟，横竖笔画直径差控制在 0.2-0.3 毫米范围内，且通过金丝镶嵌工艺实现 0.05 毫米级的线条边缘精度。这种将铸造技术、贵金属加工与书法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既体现战国时期曾国冶铸技术的领先地位，也反映出礼乐制度鼎盛阶段对器物审美的极致追求^[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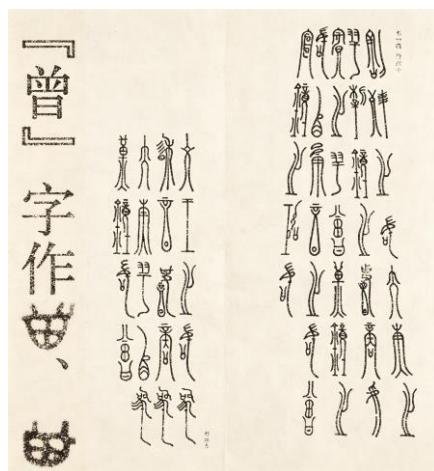


图 1 “曾”字铭文书体（左） 曾侯乙编钟错金篆书（右）

该分期体系通过量化分析揭示曾国青铜器铭文从技术制约到艺术自觉的演进规律，为周代区域文字史研究提供重要类型学参照。

2. 特殊符号

曾侯乙墓出土三戈戟（M1:13）秘部阴刻的龙形徽记，其核心结构呈现“S”形躯干与分叉尾翼的组合特征，经与商代晚期纱帽山遗址铜尊（M4:2）腹部铸造的“鼃”符号对比，发现二者存在显著承袭关系，证实“曾”源自“鼃”的图腾演化^[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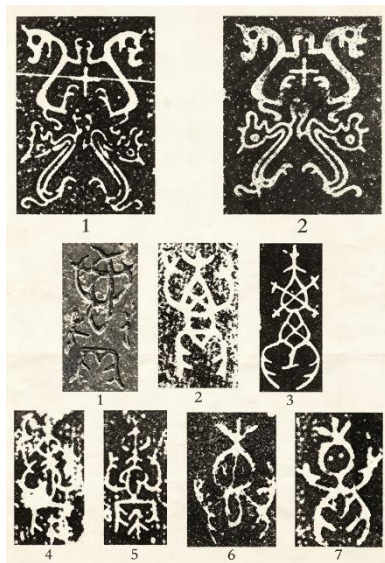


图2 龙形徽记与“鼃”符号对比

三、铭文研究的学术价值

（一）补史证史

2013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以135字铭文明确记载，“周室之封，曾国初立，实为随国”，首次从曾国君主角度自证其国即传世文献中的随国。2019年发现的楚王鼎则以“楚王媵随仲半加”七字铭文，与《左传》记载的楚随联姻形成呼应——“半加”正是嫁入随国的楚国公主，该鼎即为楚惠王为女儿制作的媵器。这项发现不仅终结了史学界关于“曾随是否一国”的百年论战，还填补了周代诸侯国研究的重要缺环^[9]。

春秋中期“曾侯與”编钟铭文记载，“王命南公，涉政淮夷，绥靖南疆”，佐证周初分封曾国（即随国）时赋予的军事代管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周早期“鄂侯弟历季”尊铭“君庇淮夷”，反映周王朝对归顺部落实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指出，“‘涉政’与‘君庇’两种治理模式，实为周人在南土推行的刚柔并济之策——前者强调武力震慑，后者侧重文化认同^[16]。”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形成时空印证，随州羊子山鄂国墓地出土的“噩侯驭方”鼎，记录西周厉王时期鄂国联合淮夷反叛被剿灭的史实；而曾国墓地持续出土的“曾伯”系列青铜器，则展现这个“汉阳诸姬”代表如何履行“绥靖淮夷”的使命。中国社科院徐良高研究员分析，“周人通过分封曾国监控鄂国，又在淮夷地区培植亲周势力，这种‘以姬姓制异姓，以归化制蛮夷’的治理智慧，确保了南土三百年的相对稳定。”

（二）文化交融研究

湖北随州考古发现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铭文与乐器实证，勾勒出周楚文化在汉淮流域深度互动的历史图景。枣树林墓地出土的“曾侯與”编钟与擂鼓墩战国墓群文物，以跨越四百年的物质遗存，揭示了姬周礼乐文明与楚地文化从传播到融合的动态过程。春秋中期“曾侯與”编钟铭文“余为民父母，永保用享”的记载，将《尚书》“天子作民父母”的民本理念提前实证化。与之形成时空呼应的是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其完备的十二律体系不仅继承周礼“三分损益法”，更融合楚地音律特色——钟架浮雕中的龙蛇纹饰与《楚辞》“陈钟按鼓”的记载形成跨媒介印证^[3]。考古发现揭示文化互动的双向性，周代分封的曾国完整保存了“钟鸣鼎食”的周礼体系，其青铜器铸造采用失蜡法等楚地工艺；

而楚墓出土的升鼎、束腰平底鼎等礼器，又明显受到周制影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强调，“曾侯乙编钟将周人十二律与楚式‘颀曾’生律法结合，创造出‘一钟双音’的突破性成就，这正是文化融合的物化表现^[1]。”

苏家垄遗址出土“金道锡行”铭文，实证青铜原料流通网络。提到苏家垄遗址发现了大量与青铜冶炼相关的遗存，比如铜矿炼渣遗迹达 75 万平方米，还有炼铜炉、铜矿石、鼓风管、铜锭等，这些冶炼遗存的存在说明这里曾是青铜生产的重要地点^[17]。

四、结论

曾国青铜器铭文研究揭示了三个重要维度。铭文证实曾国作为“汉东大国”的战略地位，其从周室藩屏到楚之附庸的转变，折射出周代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铭文书体演变、音律铭文、儒家思想萌芽，展现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轨迹。“金道锡行”铭文与失蜡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见证中国古代青铜技术巅峰^[12]。

参考文献

- [1] 黄大同.公元前 5 世纪曾国宫廷金石乐队的钟磬合奏设计——曾侯乙编磬铭文复原与其主题内容解读[J].文化艺术研究,2024,(06):34-52+114.
- [2] 吴超.试论新出曾国铜器与《诗经·召南》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4(03):150-159.
- [3] 黄锦前.新出曾伯■壶铭文所见春秋早期曾国历史与思想[J].人文论丛,2023,40(02):39-46.
- [4] 黄锦前.据人名称谓例谈对曾国铜器铭文中有关人物身份的理解[J].湖南博物院院刊,2022,(00):209-215.
- [5] 皮曙初.奇瑰编钟背后的“曾国”，是怎样“挖”出的[N].新华每日电讯,2022-09-09(011).DOI:10.28870/n.cnki.nxhmr.2022.006913.
- [6] 王晖.加嫫编钟铭文研究——兼论曾国从周之方伯到楚之附庸的转变[J].中国史研究,2022,(01):5-20.
- [7] 陈氏镇.新出铜器与伯括、南公及曾国始封试探[J].西部史学,2021,(02):13-33.
- [8] 王肖丹.西周早期曾国同铭器铭文书体例说[J].中国书法,2021,(12):168-169.
- [9] 黄锦前.曾国青铜器的最新发现与研究[J].海岱考古,2021,(00):341-370.
- [10] 孙可馨.两周时期曾国青铜容器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21.DOI:10.27363/d.cnki.gtsfu.2021.000512.
- [11] 黄尚明,关晓武.试论曾国铜器铭文的纪年法[J].江汉考古,2021,(02):64-66.
- [12] 黄锦前,梁啸.曾国青铜器的最新发现及其意义[J].西部史学,2019,(02):64-76.
- [13] 黄尚明.从青铜器铭文看曾国贵族的婚姻关系[J].江汉考古,2017,(04):64-71.
- [14] 张昌平,李雪婷.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J].江汉考古,2014,(01):65-75.
- [15] 黄凤春,陈树祥,凡国栋.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J].文物,2011,(11):78-86+97+2-3.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1.11.004.
- [16] 郭长江,凡国栋,陈虎,等.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J].江汉考古,2020,(01):3-30+2.

- [17] 瞿磊,张吉,吴冬明,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 2018 年考古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9,(06):32-49+2+149.
- [18] 黄锦前.说“曾”[J].文物春秋,2024,(04):23-30.DOI:10.13635/j.cnki.wwcq.2024.04.005.

A Study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Artifacts from the Zeng State

Liu Huifei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100191)

Abstract: The State of Zeng, a Ji-clan vassal state enfeoffed in the Han Dong region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existed for approximately 700 years. With Suizhou in Hubei as its center, it controlled the vital “Jin-Dao-Xi-Xing” trade route and served as a strategic hub for the Zhou Dynasty’s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thern territorie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noble tombs and bronze artifact assemblages from the State of Zeng (such as those at the Yejiashan, Zaoshulin, and Leigudun sites) provide a complet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spanning from the Western Zhou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 more than 300 inscribed bronze artifacts unearthed have become crucial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Zeng.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reveals that the State of Zeng is the “State of Sui” mentioned in historical texts. Through cross-verification of the “Zeng Hou Yu” chime bells and the “King of Chu’s Consort Sui Zhong Mi Jia” tripod, the century-long “Zeng-Sui controversy” has been resolved. The content of the inscriptions, their dating method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scripts not only reconstruct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Zeng State from a vassal state protecting the Zhou court to a tributary of Chu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Zhou Dynasty’s dual governance strategy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which involved both “intervening in the affairs of the Huai Yi” and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the Huai Yi.” Culturally, the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State of Zeng fused the Zhou ritual system with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Chu region (such as the twelve-tone system of the Zeng Hou Yi chime bells), demonstrating the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Zhou and Chu civilizations. Technologically, the inscription “gold as the core, tin as the mold” and the lost-wax casting technique marked the pinnacle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technology.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tate of Zeng’s bronze artifacts provides multidimensiona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issemination of the Zhou dynasty.

Key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Zeng State; The Mystery of the Zeng Zhi;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Zhou and Chu States